

中东史研究的环境转向及领域拓展*

张玉友 应添翼

[摘要] 作为环境史的重要领域,中东环境史在近十余年来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取得了重要进展,使得中东史研究中出现了环境转向。中东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建立在中东史与环境史研究不断深入后相结合的需求之上,是当前中东史研究的一种新趋向。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农牧业生态问题、自然资源管理与利用、气候变化、自然灾害、能源开发、殖民帝国科学知识输入与中东本土知识等主题。这些研究议题旨在借助环境史这一新史学视野重新理解与构建中东史,对中东世界从兴起到衰弱的传统宏观叙事进行深入阐释与探析,并注重结合殖民主义对中东环境的影响,考察现当代中东国家的形成道路,以及纠正长期以来该地区环境退化的衰败论叙事。总体看来,尽管中东环境史研究在近年来发展迅猛,但仍有大量研究空白,诸多环境史前沿的方法论有待进一步运用。

[关键词] 中东;环境史;生态文明;衰败论叙事;阿拉伯

[中图分类号] K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26)03-0115-18

中东地处“两洋三洲五海”之地^①,自古以来一直是旧大陆上的关键枢纽,对于构建全球环境史具有重要意义。传统上,中东史主要关注全球史视野下中东地区政治、经济、社会 and 文化的变迁,对于该地区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关注较少。另一方面,环境史学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以来,对中东的环境史研究曾长期处于空白,既未能引起环境史家们的关注,也没有得到中东历史学者们的重视。在环境史学初兴时,阿拉伯世界的环境史实践者并不多^②。21世纪初,约翰·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在总结环境史研究成果时指出,在阿拉伯和奥斯曼的历史学中,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对环境史的可能性漠不关心,尽管阿拉伯和伊朗的史学在农业及灌溉方面已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但很少有学者在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背景下进一步考察这些问题^③。

生态环境与自然景观在传统中东史学中虽常被触及,却多充当着历史“背景板”角色。尼罗河与两河流域的沃土、北非与阿拉伯半岛的无垠沙漠,以及骑着骆驼的阿拉伯人形象,构成中东地理文化的基本轮廓,长期主导着外界对该地区的环境想象,但未能成为历史学所关注的主要对象。近十余年间,环境史的研究视野与方法陆续引入中东史研究,诸多学者开始以环境史为主题探讨中东历史,通过研究人与自然的互动,完善与扩展传统视野,对传统的中东历史叙事产生革命性冲击。中东史与环境史之间的对话,为彼此带来丰富变化,催生新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范式,推动学科发展,实现双向重塑。一方面,环境史借助中东漫长的文明历程和多样的生态资料,更为全面地审视人与自然互动进程;另一方面,通过引入气候、生态、灾害等变量,中东史突破以政治事件和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传统范式,转向更具复杂性和动态性的历史叙事。在环境史研究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日臻成熟的当下,兴起时间较晚的中东环境史发展势头强劲,势必成为国内外学界新的学术增长点。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已开始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中东环境史的发展进行梳理与研究。整体而言,既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项目“中东史学通史(五卷本)”(23VLS027)。

① “两洋”指印度洋和大西洋;“三洲”指亚洲、非洲和欧洲;“五海”指里海、黑海、地中海、红海和阿拉伯海。

② 威廉·H.麦克尼尔等编著,王玉山译:《世界环境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第2页。

③ J.R.麦克尼尔:“论环境史的自然与文化”(J.R. McNeill,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42卷第4期(2003年),第30页。

有研究对近年来中东环境史的主要成果和前景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对于推动中东环境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①。但现有研究或聚焦于对奥斯曼史学“环境史转向”的讨论,或以某些中东环境史论著为例进行分析,未能对作为整体的中东史框架进行考察,也缺乏对新世纪以来中东环境史的议题拓展和方法论意义展开讨论,更缺乏对环境史引入中东史后带来的相互影响进行透视。鉴此,本文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中东环境史研究的缘起和主要领域展开详细论述,着重分析环境转向如何推动中东史研究,最后总结研究存在的不足,并对中东环境史的未来发展作出展望,以期增进国内学界对中东环境史学术前沿的了解与关注。

一 “双向拓展”:中东环境史研究的缘起

长期以来,中东地区在全球环境史叙事当中是缺失的,环境史与中东史学者专注于各自的领域,未能将两者结合。直至近年来,伴随着中东史研究的深入与环境史研究的扩展,学界逐步认识到环境史研究对于中东史的价值以及将中东纳入到全球环境史叙事中的必要性。中东环境史正是中东史与环境史研究深度交集和“双向拓展”的产物。

“中东”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区性概念,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被人们广泛接受。人们在使用这一空间称谓时,对其具体范围的认识不尽相同。总体看来,一般都认同西亚北非广大地区为中东地区的范围,包括阿拉伯半岛、新月地带、埃及、马格里布在内的阿拉伯世界和土耳其、伊朗、以色列^②。中东地区不仅包括以阿拉伯人为主体的阿拉伯语为主要语言的阿拉伯世界,还包含伊朗人、土耳其人、犹太人、库尔德人、柏柏尔人等其他民族。中东地区历史悠久,涵盖了广大的地理范围,当地的生态环境在中东历史变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整个20世纪中东史研究都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采取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事方式,自然环境并未得到传统史家的太多关注。

20世纪最后40年是环境史学兴起的年代,自然环境被正式纳入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成为一种知识风尚。美国环境史学者罗德里克·纳什是第一个探索环境史定义的人,他认为环境史是“人类与其居住环境的历史联系”^③。在他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定义环境史,如伊懋可认为“环境史被较精确地定义为透过历史时间来研究特定的人类系统与其他自然系统互动的界面”^④。自然生态系统所指的是气候、地形、岩石、土壤、水、植被、动物和微生物,这些系统生产、制造出能量以及可供人类开发的资源。因此,环境史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任何影响人类生活的事物和由人类影响的事物都可以成为环境史的主题。同时,在个人与群体中形成的对于自然的观念、伦理也属于环境史研究的范畴。

① 奥努尔·伊纳尔:“作为奥斯曼研究新兴领域的环境史:史学综述”(Onur Inal,“Environmental History as an Emerging Field in Ottoman Studies: An Historiographical Overview”),《奥斯曼调查:奥斯曼研究杂志》(*Osmanlı Araştırmaları/ The Journal of Ottoman Studies*)第38期(2011年),第1~25页;克里斯·格拉蒂安:“奥斯曼环境史:中东研究的新领域”(Chris Gratien,“Ottom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New Area of Middle East Studies”),《阿拉伯研究学刊》(*Arab Studies Journal*)第20卷第1期(2012年),第246~254页;乔治·R.特兰伯尔四世:“中东史的环境转向”(George R. Trumbull IV,“The Environmental Turn in Middle East History”),《国际中东研究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第49卷第1期(2017年),第173~180页;特萨·法莫、杰西卡·巴恩斯:“中东北非的环境与社会:导言”(Tessa Farmer and Jessica Barnes,“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troduction”),《国际中东研究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第50卷第3期(2018年),第375~382页;布洛克·卡特勒:“历史的参与者:现代北非的环境与历史”(Brock Cutler,“Historical (F)actors: Environments and Histories in Modern North Africa”),《历史指南》(*History Compass*)第16卷第12期(2018年),第1~10页;伊丽莎白·威廉姆斯:“中东北非的环境史”(Elizabeth Williams,“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阿迈勒·加扎勒、廷斯·汉森编:《牛津当代中东北非历史手册》(Amal Ghazal and Jens Hansse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ern and North African History*),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28页。

② 彭树智主编:《中东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哈全安:《中东史:610—2000》,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③ 罗德里克·纳什:“美国环境史:新的教学前沿”(Roderick Nash,“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New Teaching Frontier”),《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41卷第3期(1972年),第363页。

④ 伊懋可:“导论”(Mark Elvin,“Introduction”),伊懋可、刘翠溶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Mark Elvin and Liu Ts'ui-jung, eds., *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环境史研究引进生态系统范畴,将人类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将人类历史视为一种生态系统演化过程,并以特定时空下某类社会—生态系统为基本单位,探讨系统内人类社会子系统与自然生态子系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破了历史学的固有领域,使历史思维空间大大开阔^①。中东涵盖西起摩洛哥、东至伊朗的西亚与北非地区,这片土地幅员辽阔,直径超过 6000 公里,具有多样的生态景观资源。综合而言,中东环境史是一门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中东地区人类与河流、森林、沙漠、农田、山地、城市、海洋等各种自然生态系统相互影响的历史,以此来理解与阐释中东地区的思想与文明。环境史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作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出现以后,很快扩展到世界各地,并出现“全球转向”的趋势。然而,这股知识潮流直至 21 世纪,随着环境史的重要性与关注度进一步增长方才涌入中东史研究视野中,成为近年来环境史扩展的主要方向之一。对于环境史较晚扩展至中东历史研究的原因,包茂红等学者认为阿拉伯地区的语言比较特殊,研究存在很大的困难,翻译成英语的这些地区的环境史文献也极少^②。维也纳大学近东研究所的奥努尔·伊纳尔以其研究方向奥斯曼帝国环境史为例,提出了两点原因:一是大多数历史学者彼此孤立,态度保守,他们关注的重点只局限在自己研究的特定领域内,导致研究视野受到限制,跨学科意识不强,在接受新视角、新范式和新方法论方面进展缓慢;二是历史学者们仍旧遵循欧洲传统的历史写作风格,倾向于书写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特别是内部自相残杀的权力斗争,对精英人物给予了过度关注^③。

中东地区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它曾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与中心地带,是连通世界的关键枢纽,确保了全球物种的稳定流通,承载着连接、交换与传播的功能^④。因此,研究中东地区人类与环境互动的历史能够让全球环境史焕发新的生机。中东是理解全球环境史的重要环节,中东环境史研究可以为全球气候、疾病、物种扩散提供新线索,使中东史融入全球史进程内考察人类与环境之间更大的互动过程,反过来推动环境史的发展^⑤。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兰·米哈伊尔(Alan Mikhail)强调,从公元前 3000 年到当代,中东地区为环境史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尼罗河流域、安纳托利亚、伊朗高原、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区留下了大量记录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互动的考古与书面文献材料,使中东环境史的学者们拥有可供利用的丰富资源^⑥。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中东千百年来政治、经济与社会权力的形成,始终围绕对自然资源、农业生产及乡村人口的控制展开。这一长期过程在不同时代和地区留下大量历史记录,为中东环境史研究提供了独特切入口。凭借这些材料,环境史学者得以在长达千年的长时段历史中,深入追踪自然环境演变、土地资源的利用与管控,以及人与环境之间复杂而持续的互动。如此系统且丰富的研究资源,不仅使得长时段宏观研究成为可能,也为微观视角的深入探讨提供了支撑,这是中东环境史相较于其他区域研究所具备的显著史料优势。

因此,中东环境史的兴起有其深厚的学术史基础。诸多研究成果不一定冠以“环境史”之名,却已触及自然资源开发、环境变化与社会适应等领域。正是为了探讨这些问题,学界深度挖掘大量材料,扩展出丰富的专题研究,为后续从整体性视角审视人类社会与自然互动,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中东环境

① 本段文字参考了清华大学梅雪芹教授两场讲座的相关内容,分别是 2020 年 7 月 1 日在江西师范大学所作的“生态世界的联结与重塑——环境史与世界近现代史的扩展”与 2022 年 4 月 18 日在四川大学所作的“突破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环境史与世界近现代史的扩展”。

② 包茂红:《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17 页。

③ 奥努尔·伊纳尔:“作为奥斯曼研究新兴领域的环境史:史学综述”,《奥斯曼调查:奥斯曼研究杂志》第 38 期(2011 年),第 24 页;戴安娜·戴维斯:“中东北非的权力,知识与环境史”(Diana K. Davis,“Power, Knowledge,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国际中东研究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第 42 卷第 4 期(2010 年),第 658 页。

④ 阿兰·米哈伊尔:“全球环境史中的中东”(Alan Mikhail,“The Middle East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J.R.麦克尼尔、艾琳·斯图尔特·莫尔丁编:《全球环境史指南》(J.R. McNeill and Erin Stewart Mauldin, eds., *A Companion to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8~169 页。

⑤ 埃德蒙·伯克:“中东环境的变迁,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 2000 年”(Edmund Burke III,“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ddle Eastern Environment, 3000 B.C.E.— 2000 C.E.”),埃德蒙·伯克、彭慕兰编:《环境与世界史,1500—2000》(E. Burke III and K. Pomeranz, eds., *The Environment and World History, 1500—2000*),奥克兰: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2~113 页。

⑥ 阿兰·米哈伊尔著,白贤达译:《奥斯曼的树下:奥斯曼帝国、埃及与环境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23 年版,第 ix 页。

史,奠定重要的史料基础与问题意识。例如,学界此前已对中东地区的经济、农牧业、人口、疾病、土地等与环境史相关的问题有所关注,但在研究范围上大多局限于地中海地区^①,在研究内容上多停留在论述人类社会本身而未意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层质变^②。约翰·麦克尼尔在其2003年的文章《论环境史的自然与文化》中提出,中东史学已经出现不少农业灌溉问题的研究,但很少有学者在环境史的视野与方法下进一步考虑这些问题,一个例外是彼得·克里斯滕森(Peter Christensen)的《伊朗舍赫尔的衰落:公元前500至公元1500年中东历史上的灌溉与环境》^③。中东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大都位于干旱半干旱地区,难以支持雨水灌溉农业发展^④。生态环境对中东古代文明的发展往往产生限制,当地社会为应对环境限制开发了灌溉生产技术,但巨大而持久的生产成本又使得社会走向崩溃。彼得·克里斯滕森系统研究了灌溉引发的环境问题,反驳了此前基于宗教与文化解释的衰弱观点,旨在从环境角度重新探讨中东世界的衰弱。他认为,伊朗古代政权高度依赖下两河流域(Lower Mesopotamia)、胡泽斯坦(Kuzistan)、锡斯坦(Sistan)等低地的灌溉系统。然而,伊朗高原在经历帕提亚和萨珊时期定居点的大幅扩张后,水资源的短缺对生产造成了根本性限制,此后的洪水、瘟疫、战争以及盐碱化、风沙堆积又对灌溉系统造成了难以修复的破坏^⑤。然而,在此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东学界没有再出现更多环境史的作品。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直接加剧中东生态系统的压力。中东地区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不断提高的城市化率与人口密度加重了资源负担,工业污染造成空气质量不断恶化,降水减少、气温升高加重土地干旱,造成粮食减产、粮价攀升以及水源缺乏,学界甚至出现了“气候变迁导致了阿拉伯变局”的论断^⑥。马尔瓦·达欧迪把气候变化作为一种威胁扩大器和压力源,引用“人类-环境-气候安全”分析框架考察叙利亚、苏丹、摩洛哥等具体案例,指出气候压力无法直接促使冲突的发生,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执政精英意识形态与政策偏好^⑦。同世界其他地区的环境史研究缘起类似,都是在一系列生态危机的现实压力下,学界开始大规模探讨环境政治与生态治理等相关问题,同时亦有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关注和研究中东环境史^⑧。因此,根本而言,中东环境史研究的兴起是对现实的历史思考。这些历史学者回顾了中东历史上的生态危机与人类社会的回应方式,自觉探讨过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互动、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化,从而深度体现出文明之思。

-
- ① 相关研究主要包括:罗素·梅格斯:《古代地中海世界的树木与木材》(Russell Meiggs, *Trees and Timber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orld*),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J.R.麦克尼尔:《地中海世界的山脉:一部环境史》(J.R. McNeill, *The Mountains of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阿诺德·格罗夫、奥利弗·莱克哈姆:《地中海欧洲的自然》(Arnold Grove and Oliver Rackham, *The Nature of Mediterranean Europe*),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唐纳德·休斯:《地中海:一部环境史》(J. Donald Hughes, *The Mediterranea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斯塔芭芭拉:美国文献中心-克利俄出版社2005年版;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等译:《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佩里克林·霍登、尼古拉斯·普塞尔著,吕厚量译:《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
- ② 肖文超:《中东史研究的环境转向——评米哈伊尔〈奥斯曼的树下:奥斯曼帝国、埃及与环境史〉》,《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6期,第145页。
- ③ J.R.麦克尼尔:“论环境史的自然与文化”,《历史与理论》第42卷第4期(2003年),第30页。
- ④ 一般认为,年降水量在250毫米以下是无法发展雨水灌溉农业的。年降水量在250至400毫米之间则需要发展灌溉工程支持农业发展。
- ⑤ 彼得·克里斯滕森:《伊朗舍赫尔的衰落:公元前500至公元1500年中东历史上的灌溉与环境》(Peter Christensen, *The Decline of Iran Shahr: Irrigation and Environments in the History of Middle East, 500 B.C. to 1500 A.D.*),哥本哈根:图斯库拉努博物馆出版社1993年版。
- ⑥ 韩志斌:《气候变迁与阿拉伯变局——兼论与叙利亚危机肇端的内在逻辑关系》,《外国问题研究》2017年第2期,第4~11页。
- ⑦ 马尔瓦·达欧迪:《叙利亚冲突的起源:气候变化与人类安全》(Marwa Daoudy, *The Origins of Syrian Conflict: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Security*),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马尔瓦·达欧迪:《气候与冲突关系的再思考:人类-环境-气候安全分析方法》(Marwa Daoudy, *Rethinking the Climate-Conflict Nexus: A Human-Environmental-Climatic Security Approach*),《全球环境政治》(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第21卷第3期(2021年),第4~25页。
- ⑧ 例如,2021年智库机构阿拉伯改革倡议(Arab Reform Initiative)举办了首届中东北非环境政治会议,出版了一本由众多环境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编写的论文集,围绕环境管理制度、地方基层行动、环保主义、战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问题撰写了16篇短文[参见朱莉娅·库契·维佐索编:《中东北非的环境政治》(Julia Choucair Vizoso, ed.,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贝鲁特:阿拉伯改革倡议2021年版]。

英文发表他们的环境史成果。

在中东史和环境史“双向拓展”的背景下,中东环境史的研究议题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现状和趋向。具体而言,主要集中在中东近代帝国与其物质生态系统的互动,特别是能源、农业、气候、环境知识等几个领域,从物质到观念层层递进,揭示中东社会在环境变迁中如何调整与应对。由此,中东环境史研究在分散化的议题中呈现出整体性、连贯性的研究脉络。

1. 能源结构转型视域下的中东社会变化

约翰·麦克尼尔在考虑中东环境史的可能性时,认为同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东地区具有明显的特殊性与反常性^①。整体来看,中东地区能源转型的速度较慢,开发新技术的驱动力不足。该地区煤炭资源匮乏,在进入化石燃料时代之前长期依赖动物能量。动物是驱动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它们从田地运送货物至各个市场,或是为人类提供食物,在中东社会中长期扮演重要的角色。一些早期的研究涉及骆驼及其他用于长途运输的动物,但仅限于运输成本或使用规模^②。同欧洲地区相比,中东地区的动物饲养成本低廉,开发机械技术不具有更高的效益。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理查德·布利特(Richard Bulliet)比较了以骆驼为代表的动物能和机械能的利用成本,认为成本低廉的骆驼在公元4—6世纪前后在中东已逐步取代了轮式交通工具,而单峰骆驼与北阿拉伯马鞍的发达推动了阿拉伯征服的胜利^③。

动物同样也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重要角色,即使在帝国铺设了铁路等现代交通设施后,骆驼、牛、马、骡子仍然被用于长途货物运输或土地耕种。牛、羊等动物也是食物和衣物的来源,是财富的象征。一直到18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乡村社会几乎完全依赖畜力劳作,但是伴随着农业商业化的发展,自给农业向商品经济转变,畜力也被人力以及机器所取代^④。阿兰·米哈伊尔着重考察人与动物关系的改变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他从家畜、狗、魅力型物种(charismatic species,如狮子、大象、老虎)三类动物与人的关系互动,揭示出19世纪奥斯曼埃及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形态变化。其中,家畜被排除在主要劳力资源之外代表了农村劳动力资源结构的转变。他指出,这些变化是政治、经济和生态权力重组的结果,代表埃及从早期社会向现代治理模式的转变^⑤。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奥斯曼埃及正经历一场由畜力转为人力的能源转型过渡期。由于家畜数量锐减、土地财富集中以及大规模基建项目的兴起,使得强制劳动成为奥斯曼埃及的普遍现象,人力成为埃及能源利用的主要来源。

中东地区煤炭资源较少,但却拥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石油资源,在世界能源结构变革中具有重大影响。中东石油的分布状况具有地缘政治意义,对石油的开采与提炼也对该地区的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⑥。随着石油开采量的增加,快速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带来了更大的社会经济差距与环境污染。威廉·贝纳特与洛特·休斯在英帝国环境史的研究框架下,追踪了中东在内的殖民地环境变化,并以科威特为例研究英国在中东的石油开采对当地贝都因牧民的影响。其着重揭示石油经济如何冲击牧

① 麦克尼尔追溯了中东地区环境历史的三种反常现象:海路格局发达但淡水资源匮乏;草原分布集中,牧民所占人口比例高;长期依赖生物能与动物能,进入化石燃料时代较晚,煤炭资源不足,20世纪被石油能源彻底改造[参见J.R.麦克尼尔:“中东与北非环境史的特殊性”(J.R. McNeill, “The Eccentricit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s Environmental History”),阿兰·米哈伊尔编:《沙中之水:中东和北非的环境史》(Alan Mikhail, ed., *Water on Sand: Environmental Historie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② 伊尔贝·奥尔泰利:“骆驼的运输成本曲线研究”(İlber Ortaylı, “Devenin Taşıma Maliyeti E ğrisi Üzerine Bir Deneme”),《政治科学学院学报》(*Siyasal Bilgiler Fakültesi Dergisi*)第28卷第1期(1973年),第181~190页;苏芮雅·法若奇:“骆驼、马车与奥斯曼帝国”(Suraiya Faroqi, “Camels, Wagons, and the Ottoman State”),《国际中东研究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第14卷第4期(1982年11月),第523~529页。

③ 理查德·W.布利特著,于子轩、戴沛译:《骆驼与轮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④ 阿兰·米哈伊尔:《奥斯曼的树下:奥斯曼帝国、埃及与环境史》,第150~153页。

⑤ 阿兰·米哈伊尔:《奥斯曼埃及的动物》(Alan Mikhail, *The Animal in Ottoman Egypt*),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⑥ 蒂莫西·米歇尔:《碳民主:石油时代的政治权力》(Timothy Mitchell, *Carbon Democracy: Political Power in the Age of Oil*),纽约:沃素出版社2011年版;J.R.麦克尼尔:“中东与北非环境史的特殊性”,阿兰·米哈伊尔编:《沙中之水:中东和北非的环境史》,第27~50页。

民传统游牧方式,城市化与工业化改变沙漠景观与贝都因人生活,原先以骆驼为核心的游牧生活遭到现代基础设施挑战,深刻重塑当地社会结构与生态关系^①。翁·巴拉克聚焦于英帝国碳能源在中东的流动,揭示了碳能源的全球化与煤炭对中东现代世界的塑造作用^②。

2. 作物交换与中东农业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

中东是农业活动的发源地,大多数驯化动植物从这里开始了向外传播进程^③,尽管这种传播会由于不同的地形、气候等原因而进展缓慢,但古代帝国的兴起为商品与人员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例如,在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相对和平时期,公元10—13世纪的阿拉伯贸易网把糖、棉花、大米与柑橘类水果从印度带到了埃及和地中海地区,这些作物以及栽培技术的流动在当地引发了小型社会变革^④。安德鲁·沃森通过考察阿拉伯征服后四个世纪里的农业变迁,指出伊斯兰教的统一与扩张使得高粱、小麦、甘蔗、西瓜等大量的作物以及先进的耕作技术能够在伊斯兰世界内外传播。早期伊斯兰扩张期并非近东农业的衰退期,而是掀起了一场“伊斯兰绿色革命”,对重建农业系统做出了重大贡献^⑤。与罗马晚期相比,早期的伊斯兰世界正处于一个农业与人口的扩张期。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带来了世界性的改变,新旧大陆掀起的“哥伦布大交换”将烟草、玉米、西红柿等作物引入奥斯曼帝国,使得经历了小冰期的奥斯曼居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同时促进了农业多样性与市场消费^⑥。接着,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开始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加深了其农业的商业化,耕种的土地迅速增加。融入更大的市场体系带来了城市与农村环境的重大改变,城镇的发展、人口的膨胀、生产与消费的增加均在侵蚀生态系统。在大量研究关注该时期奥斯曼帝国农业史的同时,也出现了少量涉及农业生态环境的问题。梅尔腾·托克瑟兹探索了阿达纳(Adana)地区大规模棉花农业的出现,她以奥斯曼帝国与外国档案文件为基础,探讨了地方与国际力量在丘库罗瓦(Cukurova)平原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商业体系中的作用^⑦,她的研究侧重于水源、土壤等自然地理条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殖民时代埃及的农业生态环境也是学界考察的一个重点,殖民经济在埃及引入大规模的棉花种植,深刻改变埃及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在改变人类的历史,呈现出一部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相互改造的协同演化史。珍妮弗·德尔关注殖民经济如何通过常年种植棉花和灌溉活动来创造新的尼罗河生态环境,以及由此造成新兴疾病的流行。19至20世纪殖民经济在埃及的发展使得灌溉农业盛行,大量堤坝和水库被大规模修建导致尼罗河水流速度放缓,钉螺与蜗牛在静水环境中大量繁殖,引起大批灌溉农民感染血吸虫病。此后,埃及政府与国际卫生官员为消灭血吸虫病而采用多种方法改造当地环境。她将尼罗河视为一个在时间、空间和物质上构成殖民经济特定关系的领域,讲述了19—20世纪初建造新尼罗河的工程师、资本家、政治当局与劳工群体的故事^⑧。亚伦·杰克斯追溯了英国在埃及

① 威廉·贝纳特、洛特·休斯:《环境与帝国》(William Beinart and Lotte Hughes, eds., *Environment and Empire*),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51~268 页。

② 翁·巴拉克:《帝国动力:煤炭如何塑造中东和引发全球碳化》(On Barak, *Powering Empire: How Coal Made the Middle East and Sparked Global Carbonization*), 奥克兰: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③ 中东地区在公元前 9500 年到公元前 7500 年已开始向农业过渡,尝试对谷类、豆类、动物进行驯化。小麦、大麦、黑麦最早在新月沃地广泛栽培。稍晚,豆科作物中的豌豆、扁豆、鹰嘴豆也开始被驯化,最早的驯化动物如绵羊、山羊也在此出现(参见彼得·贝尔伍德著,陈洪波等译:《最早的农人:农业社会的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60~61、70 页)。

④ 威廉·H.麦克尼尔等编著:《世界环境史》,第 25~29 页。

⑤ 安德鲁·沃森:“阿拉伯农业革命及其传播,700—1100 年”(Andrew M. Watson, “The Arab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ts Diffusion, 700—1100”), 《经济史》(*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第 34 卷第 1 期(1974 年),第 8~35 页。

⑥ 费赫米·伊尔玛兹:《奥斯曼帝国的烟草:社会、政治与经济分析(1600—1883 年)》[Fehmi Yılmaz, *Osmanlı İmparatorluğu'nda Tütün: Sosyal, Siyasal ve Ekonomik Tahlili, 1600—1883*], 马尔马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5 年。

⑦ 梅尔腾·托克瑟兹:“地理、生产、区域:19 世纪的丘库罗瓦”(Meltem Toksöz, “Bir Coğrafya, Bir Ürün, Bir Bölge: 19. Yüzyılda Çukurova”), 《凯比凯奇》(*Kebikeç*) 第 21 卷(2006 年春),第 97~110 页;梅尔腾·托克瑟兹:《地中海东部的移民与棉花:1850—1908 年阿达纳—梅尔辛地区的成型》(Meltem Toksöz, *Nomads, Migrants and Cotton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The Making of the Adana-Mersin Region 1850—1908*), 莱顿:布里尔出版社 2010 年版。

⑧ 珍妮弗·德尔:《尼罗河的生命:埃及的环境、疾病和物质性的殖民经济》(Jennifer L. Derr, *The Lived Nile: Environment, Disease, and Material Colonial Economy in Egypt*), 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推行殖民主义经济的复杂后果,特别是金融资本的崩溃和由于棉花管理而造成的农业生态退化,以此思考环境、殖民帝国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①。

3. 奥斯曼帝国及埃及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与管理

当代中东环境史学者将目光聚焦到了农民等底层的历史。奥斯曼帝国幅员辽阔,地跨多个气候带和地质区域,拥有多种生态系统。帝国的税收与粮食高度依赖埃及的灌溉农田,需要依靠当地底层农民的知识与经验来管理其经济与政治权力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形成了帝国政府协同、乡村社群自治的管理机制。农民长期扮演着奥斯曼埃及灌溉事业中的核心角色,他们在埃及水源管理方面丰富的知识与经验使得他们成为乡村灌溉事业中最具话语权的群体。当前的奥斯曼环境史著作利用奥斯曼档案文件、伊斯兰法庭记录、土地调查等文献资料,详细描述了奥斯曼埃及的农民如何与当地政权互动,试图将农民纳入帝国的治理体系框架中加以考察。

阿兰·米哈伊尔是近年来最为关注中东环境史的学者之一,他将埃及视为理解生态环境在奥斯曼帝国的政治中发挥作用的完美案例,其论著基本都是以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埃及为叙述中心,特别关注政治权力变化与自然资源管理的联系。其作以18世纪埃及农村灌溉和用水的社会环境史为角度,探讨帝国与其省份埃及之间的关系。他根据埃及偏远地区城镇与农村的地方档案,描绘出对自然资源控制的变化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奥斯曼帝国在埃及和整个帝国的主权性质。他认为,在穆罕默德·阿里时代之前,尼罗河水域主要是通过埃及农民数百年的经验基础进行管理,这种地方知识得到了奥斯曼帝国的深切关注^②。《奥斯曼的树下:奥斯曼帝国、埃及与环境史》从水、劳动、动物和自然元素四大主题入手,将奥斯曼帝国视为一个生态系统,揭示了各种环境要素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奥斯曼帝国长达数个世纪的历史的各个方面都是建立在其对自然资源的管理之上。奥努尔·伊纳尔与亚维兹·科斯提出,传统史学把奥斯曼帝国的成功主要归因于帝国的军事实力和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但从环境史角度来看,奥斯曼帝国对自然和人力资源的控制和调动能力是其实力强大的关键,这是由其内部经济、社会与自然的紧密联系所决定的^③。费萨尔·侯赛因关注奥斯曼帝国管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历史,17世纪末幼发拉底河航道转移使得此前帝国在此建立的农村秩序走向瓦解,伊拉克省级自治的趋势开始出现^④。

奥斯曼帝国的城市对水资源的运输、控制和利用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伊斯坦布尔是一座被水包围的城市,由于其人口众多,供水一直是当局的重要事项^⑤。土耳其学者对伊斯坦布尔和其他省的供水和管理状况有所探讨^⑥,这些研究有助于了解水源在过去对日常生活质量的影响。比如,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征服伊斯坦布尔后,下令修复并扩建原有水道,主要收集哈尔卡利(Halkali)水源引入城市;苏莱曼一世统治时期,又从伊斯坦布尔北部森林等广阔区域注入新水源,最终实现城市全面供水,改变了居民日常生活。

-
- ① 亚伦·杰克斯:《占领埃及:殖民经济与资本主义危机》(Aaron Jakes, *Egypt's Occupation: Colonial Economism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 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 ② 阿兰·米哈伊尔:《奥斯曼埃及的自然与帝国》(Alan Mikhail, *Nature and Empire in Ottoman Egypt: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 ③ 奥努尔·伊纳尔、亚维兹编:《权力的种子:奥斯曼环境史的探索》(Onur Inal and Yavuz Köse, eds., *Seeds of Power: Explorations in Ottom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剑桥:白马出版社 2019 年版。
 - ④ 费萨尔·侯赛因:《苏丹之河:奥斯曼帝国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Faisal H. Husain, *Rivers of the Sultan: The Tigris and Euphrates in the Ottoman Empire*),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
 - ⑤ 舒克鲁·索内泽、索纳尔·萨辛、伊尔克·阿克图·科拉伊:“奥斯曼时期伊斯坦布尔的水道”(Şükrü Sönmez, Soner Şahin and İlknur Aktuğ Kolay, “İstanbul’daki Osmanlı Dönemi Suyolu Yapıları”), 《土耳其研究》(*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第 13 卷第 18 期(2018 年), 第 1191~1226 页。
 - ⑥ 奥勒尔·奥努尔:《历史上的伊斯坦布尔水域和伊斯坦布尔供水与污水问题》(Oral Onur, *Tarih Boyunca İstanbul Suları ve İstanbul Su ve Kanalizasyon Sorunu*), 伊斯坦布尔:斯姆林格出版社 1983 年版;海达尔·卡兹甘、萨米·厄纳尔:《伊斯坦布尔的水历史:伊斯坦布尔水问题和奥斯曼帝国外国水公司的历史渊源》(Haydar Kazgan and Sami Önal, *İstanbul’da Suyun Tarihi: İstanbul’un Su Sorununun Tarihsel Kökenleri ve Osmanlı’da Yabancı Su Şirketleri*), 安卡拉:埃菲尔出版社 2025 年版。

森林是奥斯曼帝国的主要财富来源之一,木材是帝国重要的战略物资,用以满足帝国日益旺盛的造船需求。奥斯曼帝国对森林资源的管理、对木材的运输工程体现了帝国复杂的行政体系,对奥斯曼政府的统筹协调能力构成巨大考验。塞尔丘克·杜尔森对奥斯曼帝国15—20世纪初的林业管理历史做出了研究,记录和分析了帝国对森林的控制和管理能力与其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环境等方面的关系发展^①。传统观点认为,奥斯曼帝国政府在17世纪之后已经放弃了对经济事务的直接干预,但通过研究帝国对木材资源的区域调配,仍然证明了奥斯曼政府的经济干预,帝国依然能够对部分边缘区域施加影响力。

20世纪以来,中东地区经历了从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转变。尽管国家面积缩小,但改造环境、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却在大幅增长。1960年开始建造的埃及阿斯旺大坝体现的正是现代国家强大的环境控制能力,埃及这项现代重大水利工程既被视为国家的财富,也被批评为一场生态灾难。J.唐纳德·休斯以环境史的新视角重新评估了大坝的社会与环境的影响。他指出,大坝将埃及农业转向常年灌溉,不仅引起血吸虫病的大量增加,还使得河水沉淀物都沉积在了水库中,造成了严重的水涝和土地盐碱化问题,而流出大坝的水没有了泥沙作为缓冲,对河口三角洲的侵蚀作用加剧,引发了海水入侵。由于无法为土壤提供充分养料,化肥被用于农业中,污染了排水系统,造成的杂草入侵危害到当地的动植物。然而,决策者们出于政治目的忽视了大坝建造可能带来的生态危害,并打压了专家们对大坝负面影响的探讨。由此,这项对生态及人类系统罕见而严重的干预引发了一系列未曾预料到的灾难性后果^②。南希·雷诺兹认为阿斯旺大坝代表了埃及后殖民时期民族主义发展的高潮,埃及总统纳赛尔将这一工程视为与过去的决裂,旨在让埃及摆脱殖民地时期的不发达状态,实现工业化并加强水文控制以确保水和粮食的供应安全,而大坝的建造改变了当地的岩层,还将连接埃及与苏丹的努比亚地区与阿斯旺以北隔开,引发了努比亚人对环境不公的指责^③。杰西卡·巴恩斯探讨了埃及水资源在埃及土地开垦中的分配和使用,她将政府工程师关于水坝日常运行的决策与农民关于灌溉沟渠日常运行的决策结合起来,研究涉及跨越尼罗河各部分的农民、地方行政人员、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等行为主体对水资源利用能力的争辩,展示出各种参与者对水资源的知识概念化^④。

4. 气候压力加剧帝国政治危机

一般认为,中东大部分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对于气候变化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干旱与半干旱的气候特征使得每当降水量出现微小偏差时都会对农业生产活动产生强烈的影响。20世纪初,对中东地区古代文明衰弱的“气候决定论”解释曾经占据了主流地位,埃尔斯沃思·亨廷顿认为只有气候变化才能解释为何这些曾经繁荣的古代城市被大规模废弃^⑤。20世纪50年代,马歇尔·霍奇森强调中东气候及生态的长期稳定性,他认为“中干旱地带”是伊斯兰文明的地理连接特征,类似的气候条件促使其历史统一性,共同的规范和伦理在这一生态约束下迅速传播^⑥。这一观点仍然带有浓厚的“气候决定论”色彩。当前中东环境史研究者对于这一问题做出了积极回应,他们综合各种科学数据与文献材料,巧妙而谨慎地将气候变化作为一种社会压力源纳入历史解释框架。

-
- ① 塞尔丘克·杜尔森:《森林与国家:奥斯曼帝国林业与森林管理史》(Selçuk Dursun, *Forest and the State: History of Forestry and Forest Administration in the Ottoman Empire*), 萨班哲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年。
- ② J.唐纳德·休斯:“阿斯旺大坝:环境史能为决策提供信息吗?”(J. Donald Hughes, “The Dams at Aswan: Does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form Decisions?”), 《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第11卷第4期(2000年)第73~81页; J.唐纳德·休斯著,赵长风、王宁、张爱萍译,《世界环境史:人类在地球生命中的角色转变》,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198~205页。
- ③ 南希·雷诺兹:“建造过去:埃及的岩石景观与阿斯旺大坝”(Nancy Y. Reynolds, “Building the Past: Rockscapes and the Aswan High Dam in Egypt”), 阿兰·米哈伊尔编:《沙中之水:中东和北非的环境史》,第181~205页。
- ④ 杰西卡·巴恩斯:《培育尼罗河:埃及日常的水政治》(Jessica Barnes, *Cultivating the Nile: The Everyday Politics of Water in Egypt*), 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 ⑤ 埃尔斯沃思·亨廷顿:《巴勒斯坦及其转变》(Ellsworth Huntington, *Palestine and Its Transformation*), 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11年版,第249~283页。
- ⑥ 马歇尔·霍奇森:《伊斯兰的冒险第2卷:伊斯兰中世纪的扩张》(Marshall Hodgson, *The Venture of Islam, Volume 2: The Expansion of Islam in the Middle Periods*),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69~74页。

中东气候史的一些著作挑战了中世纪是全球变暖期的主张^①，相关学者运用波斯语与阿拉伯语的资料表明伊朗和中亚地区正经历着相反的情况。理查德·布利特认为，先前的气候史研究偏向于进行全球或半球规模的气候复原，忽视局部的区域性气候异常，特别是“中世纪温暖期”无法解释 10 至 12 世纪伊朗经历的“大寒流”气候现象。他挖掘编年史材料，以蒙古树轮为辅助证据，指出该时段伊朗正经历一次显著的寒冷期。棉花是喜暖的夏季作物，紧随其后的气候变冷，造成棉花生产的衰退。在生存压力下，大批农民将棉田改为麦田。此外，这一气候变化促使操突厥语的游牧民族大规模迁徙到伊朗^②。这些研究表明，自中世纪以来，中东地区经历了多个气候周期，与该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以及宗教的历史高度相关。在这一时期结束后，中东地区进入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气候温和期，反过来促使奥斯曼帝国、萨法维帝国和莫卧儿帝国的兴起。

16—17 世纪，小冰期的到来迫使奥斯曼帝国进入动荡与转型时期。关注奥斯曼帝国环境史的学者试图使用旅行游记、领事报告、政府信函等书面材料，或运用沉积物、树木年轮等气候生态研究，以此重建奥斯曼帝国的气候变迁，这些材料提供了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段的天气条件以及农业生产的详细信息。树木年轮的研究表明，16 世纪中叶到 17 世纪末的小冰期对帝国境内的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东地中海经历了持续多年的严重干旱，气温持续下降，大雪、洪水等灾害不断。农作物的歉收破坏了帝国对首都与前线军队的物资供应，直接推动了该时期安纳托利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土地、资源严重短缺，农民生存压力剧增，但帝国仍然压榨民众以维持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并直接导致了杰拉里起义(Celali Rebellion)的爆发^③。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萨姆·怀特探讨了小冰期气候波动对奥斯曼严重而深远的影响，包括土地危机、人口下降与社会经济的收缩，进而对 16—18 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历史有了新的解释。萨姆·怀特提出，当前把奥斯曼帝国走向“衰弱”的原因简单归咎于旧制度的衰败或欧洲崛起的挑战是缺乏说服力的，奥斯曼帝国很大程度上经历着干旱、歉收、严冬、暴力、饥饿和疾病的考验，多数地区的人口与耕地难以复原到灾害前的水平，游牧民得以大规模流动，帝国对地方权力的分散为各省的私人地产发展提供便利。因此，历史学者必须考虑近代早期中东的生态环境，包括小冰期造成的深远影响^④。

同样，18 世纪最后 20 年也是一个气候波动的时期。1783 年 6 月，冰岛拉基火山爆发，其产生的火山灰导致欧洲、地中海、美洲和中亚部分地区的寒冷夏季，中东各大河流水位急剧下降^⑤。部分对奥斯曼帝国游牧民族的研究发现，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大量的沿海平原等低洼地区被洪水淹没而形成沼泽，不少当地牧民选择迁徙到更高海拔的山区，因此占据着高原、山地的游牧民数量有所增加。这些游牧民以往只在夏季进行季节性迁移，而在 17、18 世纪则转变为一种永久性迁移，创造了新的人类生态系统^⑥。这种气候加剧了 18 世纪末的政治动荡，加之欧洲对中东的外部压力加大，最终促使奥斯曼帝国进入改革时期。

在这一主题的推动下，类似的方法也被引入对中东地区政治发展的阐释，其中尤为典型的是最近

① 艾瑞·伊萨、马特尼亚·佐哈尔：《气候变化：中东的环境与文明》(Arie S. Issar and Mattanyah Zohar, *Climate Change—Environment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柏林：斯普林格出版社 2004 年版。

② 理查德·W.布利特著，孙唯瀚等译：《9—12 世纪伊朗的棉花、气候与骆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

③ 奥努尔·伊纳尔：“作为奥斯曼研究新兴领域的环境史：史学综述”，《奥斯曼调查：奥斯曼研究杂志》第 38 期(2011 年)，第 6~7 页。

④ 萨姆·怀特：《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的气候异变》(Sam White, *The Climate of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Ottoman Empir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⑤ 阿兰·米哈伊尔：“奥斯曼与冰岛：气候史”(Alan Mikhail, “Ottoman Iceland: A Climate History”)，《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第 20 卷第 2 期(2015 年)，第 262~284 页。

⑥ 伊尔汗·沙欣：《奥斯曼时期的游牧民：研究综述》(Ilhan Şahin, *Osmanlı Döneminde Konar-göçerler: İncelemeler-Araştırmalar*)，伊斯坦布尔：艾伦出版社 2006 年版；雷萨特·卡萨巴：《流动的帝国：奥斯曼的游牧民、移民与难民》(Reşat Kasaba, *A Moveable Empire: Ottoman Nomads, Migrants, and Refugees*)，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厄恩德·比尔金：《安塔利亚的约鲁克土库曼人》(Önder Bilgin, *Antalya Yörük Türkmen Kitabı*)，伊斯坦布尔：智慧文化艺术出版社 2022 年版。

对萨法维王朝“衰弱”命题的探讨^①。詹姆斯·古斯塔夫森和詹姆斯·施佩尔同样将萨法维王朝置于“17世纪危机”下试图构建伊朗在该时期与全球环境趋势的联系。萨法维王朝通过行政官员和地方精英组成的社会网络,利用并管理自然资源,以此维持帝国经济社会秩序。萨法维王朝的衰弱,也可视为是其赖以维系统治的社会-生态网络的崩溃。基于此,他们反驳了前人历史叙事,不再将萨法维王朝的衰弱归咎于是中央对军事冲突处理不当的偶然结果的观点,提出应当更多关注17和18世纪生态环境的变化。他们结合树木年轮的相关证据,认为始于17世纪晚期的生态危机逐步破坏了萨法维王朝的统治基础,在频繁的干旱、饥荒、瘟疫影响下,萨法维王朝最终在1722年落入一群来自阿富汗的吉尔查伊人手中^②。

5. 自然灾害与传染病在帝国生态网络中的创造与传播

瘟疫长期伴随着中东的历史进程。此前大多数对中东瘟疫史的研究都集中在马穆鲁克时期,麦克·道斯等学者以阿拉伯史料为基础,发现黑死病在中东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中充当着重要角色。他们基本理清了黑死病在中东地区爆发与传播的途径,论证了黑死病对中东社会经济、人口数量等方面的负面影响^③。近年来学者们更多关注奥斯曼帝国的瘟疫史,诸多研究聚焦奥斯曼帝国对鼠疫、疟疾、饥荒、洪水等灾害的社会应对模式,以及由此引发的帝国与各类生态因素的互动。这些研究阐明疫病与其他自然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从生态网络视角将疫病嵌入近现代中东历史更迭中,认为帝国的政治与社会网络既是疫病的创造者,也是疫病的传播者。如亚龙·艾雅隆探讨了奥斯曼帝国的自然灾害史,以及在国家、公共和个人层面上对自然灾害的反应^④。努克特·瓦利克对奥斯曼帝国在黑死病及随后几个世纪的瘟疫进行了系统研究,展示了从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瘟疫是如何与帝国的环境、社会和政治结构相互作用的,认为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与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瘟疫传染病网络不断扩大的过程,而帝国的发展改变了瘟疫的流行模式,使不同的生态区域相互作用,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交流网络得以加强,帝国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有关瘟疫的新认识体系^⑤。

疟疾也是长期困扰奥斯曼帝国的传染性疾病。“小冰期”改变了帝国乡村的生态环境,沿海平原的耕地减少、沼泽增加,使得疟疾发病率上升。为了应对这种状况,人们会定期从平原迁移至山区。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晚期推动了一系列农村定居与边疆改造项目,数百万来自亚美尼亚、巴尔干、克里米亚、高加索的移民流入帝国,他们与牧民一同被帝国安置到边疆地区从事农业活动,疟疾则是这一过程中的阻碍因素。克里斯·格拉蒂安探索了国家、资本主义、战争、疾病对奥斯曼边界环境的塑造^⑥。他的研究聚焦于帝国晚期地中海沿岸的农业人口定居状况,大量的移民涌入和种植业的扩大为安纳托利亚、大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农村地区创造了更多新定居点,然而定居点经常以疟疾的形式给新移民带来苦难,尤其是地中海低地的移民。作者概述了奥斯曼国家和社会如何面对疟疾与沼泽的

-
- ① 威廉·汤普森、莱拉·扎基罗娃:《中东北非的气候变化:15000年的危机、顿挫与适应》(William R. Thompson and Leila Zakhirova, *Climate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15,000 Years of Crises, Setbacks, and Adaptation*), 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21年版。
- ② 詹姆斯·古斯塔夫森、詹姆斯·施佩尔:“萨法维王朝末期的环境危机:1666—1722年近代早期伊朗帝国生态的崩溃”(James Gustafson and James Speer, “Environmental Crises at the End of Safavid History: The Collapse of Iran’s Early Modern Imperial Ecology, 1666—1722”), 《国际中东研究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第54卷第1期(2022年), 第57~79页。
- ③ 麦克·道斯:《中东黑死病》(Michael W. Dols, *The Black Death in the Middle East*),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 麦克·道斯:“1347—1894年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及其在中东的复发”(Michael W. Dols, “The Second Plague Pandemic and Its Recurrences in the Middle East, 1347—1894”), 《东方经济与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第22卷第2期(1979年5月), 第162~189页; 奥汉·基里奇:《世界和奥斯曼帝国的流行病》(Orhan Kılıç, *Genel Hatlarıyla Dünyada ve Osmanlı Devleti’nde Salgın Hastalıklar*), 埃拉泽:菲拉特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④ 亚龙·艾雅隆:《奥斯曼帝国的自然灾害:瘟疫、饥荒与其他灾难》(Yaron Ayalon, *Natural Disasters in the Ottoman Empire: Plague, Famine, and Other Misfortunes*),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 ⑤ 努克特·瓦利克:《近代早期地中海世界的瘟疫与帝国:1347—1600年的奥斯曼经验》(Nükhet Varlık, *Plague and Empire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 World: The Ottoman Experience, 1347—1600*),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 ⑥ 克里斯·格拉蒂安:《未定的平原:奥斯曼帝国晚期边疆的环境史》(Chris Gratien, *The Unsettled Plai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Frontier*), 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难题,及其对当地政治与经济的影响^①。

而在北非的环境史中,一些关键自然灾害的发生以及当地社会对灾害的理解与体验,为非殖民化进程增添了驱动力。布洛克·卡特勒探讨了19世纪60年代阿尔及利亚在持续干旱、蝗虫入侵、流行病暴发等自然灾害事件下引发的水资源危机,殖民当局对阿尔及利亚水利基础设施的控制与其对水、卫生的权力话语加大了殖民者与阿尔及利亚本土民众之间的鸿沟,促使阿尔及利亚人国家意识的出现^②。斯宾塞·塞加拉以四场自然和人为灾害为核心,将其置于非殖民化进程下加以考察,论述了灾难如何催生出新的政治和社会形态,以及当地人民如何解释和应对这些灾难,以此把环境叙事融入政治与文化的非殖民化叙事当中^③。阿兰·米哈伊尔更是超越了传统的自然灾害叙事内容——疾病、洪水、地震和火灾,以1787年开罗爆炸作为一个独特事件,分析爆炸与埃及商业社会、阶级结构的关系,进而揭示了“爆炸”的环境史意义^④。

6. 殖民帝国科学知识 with 中东本土知识的互动

一个地区的环境实践与知识生产代表了在独特的当地生态环境中所积累的经验。中东大部分地区缺乏足够的水源,无法形成密集的定居点,干旱土地所占比例很大,当地居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发展出水源利用的本土专业知识,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和利用水资源。然而殖民政府却未能理解中东本土知识,最终导致其推行的环境政策带来了诸多问题。

戴安娜·戴维斯与埃德蒙·伯克特别关注到中东本土知识如何受到殖民扩张与实践的影响,首次批判性地审视了西方对中东自然环境的东方主义构建,揭露了自殖民时代以来西方将中东描绘为环境退化、处于生态生存能力边缘的地区,继而实施了诸多推动殖民计划的环境政策^⑤。这种对东方生态环境的衰败想象在西方广为流传,当地政权或本土住民被指责为环境与资源的破坏者,为西方国家以生态拯救为名义推行殖民扩张铺平道路。基于此,殖民者占据中东土地,实施诸多农业与生态改造项目,力图将殖民地恢复到古代文明的繁荣状态,为殖民活动提供合法性依据。然而,由于未能理解当地的环境实践,殖民官员提出的诸如让撒哈拉沙漠开花、在埃及西南部沙漠的土地复垦等计划均是不切实际的。戴安娜·戴维斯在其另一部关于北非环境史与法国殖民扩张的著作中采取后殖民理论与方法,修正西方关于北非森林砍伐与荒漠化的衰败论叙事错误,重新评估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等干旱土地上进行殖民项目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目标,说明了环境叙事在帝国扩张中的关键作用^⑥。法国殖民官员将该地区视为昔日的“罗马粮仓”,指责牧民粗放的生产方式是造成北非干旱的主要原因,从而证明殖民政府环境干预的正当性。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了20世纪的伊拉克沼泽地,这片沼泽被视为是《圣经》中的“伊甸园”。布里奇特·瓜拉希注意到,在伊拉克,沼泽地是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反抗奥斯曼帝国、英帝国以及复兴党统治的重要据点,萨达姆·侯赛因此发

① 克里斯·格拉蒂安:“奥斯曼的湿地:疟疾、沼泽与奥斯曼晚期地中海定居点”(Chris Gratien, “The Ottoman Quagmire: Malaria, Swamps, and Settlement in the Late Ottoman Mediterranean”),《国际中东研究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第49卷第4期(2017年),第583~604页。

② 布洛克·卡特勒:“水的狂躁:干旱与19世纪阿尔及利亚的统治术语”(Brock Cutler, “‘Water Mania!’: Drought and the Rhetoric of Rule in Nineteenth-Century Algeria”),《北非研究》(*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第19卷第3期(2014年),第317~337页。

③ 斯宾塞·塞加拉:《帝国与灾难:1954年以来北非与地中海的非殖民化和环境灾难》(Spencer D. Segalla, *Empire and Catastrophe: Decolon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Disaster in North Africa and Mediterranean France since 1954*),林肯: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④ 阿兰·米哈伊尔:“开罗爆炸:灾难中的埃及,1787年”(Alan Mikhail, “Boom Cairo: Egypt in Disaster, 1787”),《国际中东研究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第56卷第2期(2024年),第1~14页。

⑤ 戴安娜·戴维斯、埃德蒙·伯克编:《中东北非的环境想象》(Diana K. Davis and Edmund Burke III, eds., *Environmental Imaginarie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阿森斯:俄亥俄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⑥ 戴安娜·戴维斯:《复兴罗马粮仓:北非的环境史和法国殖民扩张》(Diana K. Davis, *Resurrecting the Granary of Rom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French Colonial Expansion in North Africa*),阿森斯:俄亥俄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戴安娜·戴维斯:“马格里布的‘废弃’沙漠:北非法国殖民环境史中的荒漠化叙事”(Diana K. Davis, “Desert ‘Wastes’ of the Maghreb: Desertification Narratives in French Coloni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North Africa”),《文化地理》(*Cultural Geographies*)第11卷第4期(2004年),第359~387页。

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湿地排水运动,而此后的多边组织则利用“复兴伊甸园”这一特定的空间想象塑造沼泽地国家公园^①。

事实上,西方科学知识的输入与中东本土知识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中东本土官员也试图引入西方科技来改造中东社会。奥斯曼帝国曾推行实验农场,试图打造一个全帝国的知识网络,传播有关科学农业的知识。奥斯曼官员也曾参加 1893 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或是将新近出版的农业文本翻译为奥斯曼文,评估西方科学技术能否应用到整个帝国^②。然而,即使许多农民知道这些新的技术与工具,但往往还是由于其无法适应当地条件而放弃。艾迪尔·瓦赫斯关注了法国委任统治对叙利亚与黎巴嫩的农业生态干预模式,认为其经历了从东方主义向国家官僚式的转变,而法国官员仍然较少考虑当地环境的特殊性,推行的诸多农业项目接连受挫^③。

最后,一批采取人类学方法的著作也在近年问世,对中东本土居民的地方知识与环境感知展开了研究。斯塔莱·克努森通过对土耳其黑海沿岸城市特拉布宗附近渔村的渔业生产、消费,以及国家渔业现代化政策展开人类学调查,强调当地渔民的地方知识对海洋资源管理的作用^④。艾米丽·麦基将政治生态学与文化地理学相结合,认为“日常的纪念行为”塑造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空间身份之间的权力差异。她对内盖夫沙漠中的犹太人与贝都因人社区进行了深入的民族志调查,试图利用福柯式的话语分析解开以色列的环境叙事,揭示这种环境叙事如何形成并强化了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二元性^⑤。索菲亚·斯塔马托普卢-罗宾斯通过对约旦河西岸的杰宁(Jenin)和拉姆安拉(Ramallah)等地区长达十年的人类学研究,考察了当地巴勒斯坦人对垃圾处理的亲身体验,并描述了以色列当局是如何利用垃圾围困对这些地区进行统治与定居合法化的^⑥。穆尼拉·哈亚特关注到战争频繁的南黎巴嫩地区,认为生活艰难的当地人发展出一种“抵抗生态”的生存策略^⑦。这些作品的主题直指现实中人们面临的困境,对环境史、人类学、中东研究等多个领域都具有启发意义。

综上,中东环境史的研究成果已覆盖了中东历史的多个时段,通过探讨各个时期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反映出中东不同时代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发展状况,展现了环境在中东政治与社会变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三 推动学科发展:中东环境史研究的特点与方法论意义

与欧美环境史相比,中东环境史研究既表现出了与前者的共性,也呈现出了自身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赋予中东史研究新的方法论意义,从而实现了对中东史研究的推动作用。

一是推动中东史史料与方法论的革新。中东环境史研究侧重于中、长时段,运用跨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挖掘和整合多种史料来源,实现了史料运用与学科方法上的重大创新。学者们接受了自

① 布里奇特·瓜拉希:“国家公园:伊拉克沼泽的伊甸园复兴”(Bridget Guarasci,“The National Park: Reviving Eden in Iraq’s Marshes”),《阿拉伯研究学刊》(*Arab Studies Journal*)第 13 期(2015 年),第 128~153 页。

② 伊丽莎白·威廉姆斯:《帝国培育:奥斯曼帝国晚期与叙利亚法国委任统治时期的环境、专业知识与科学农业》(Elizabeth Rachel Williams, *Cultivating Empires: Environment, Expertise, and Scientific Agriculture in Late Ottoman and French Mandate Syria*),乔治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5 年,第 68~120 页。

③ 艾迪尔·瓦赫斯:“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委任统治:土地,生态干预与‘现代’国家”(Idir Ouahes,“French Mandate Syria and Lebanon: Land, Ecological Interventions, and the ‘Modern’ State”),乌尔丽克·基尔伯格、布雷特·本内特编:《帝国环境:生态变迁的网络与动因》(Ulrike Kirchberger and Brett M. Bennett, eds., *Environments of Empire: Networks and Agents of Ecological Change*),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61~78 页。

④ 斯塔莱·克努森:《现代土耳其的渔民和科学家:黑海东部海岸的自然资源、知识与身份的管理》(Ståle Knudsen, *Fishers and Scientists in Modern Turkey: The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Knowledge and Identity on the Eastern Black Sea Coast*),纽约:贝格汉恩出版社 2008 年版。

⑤ 艾米丽·麦基:《冲突中的定居:内盖夫景观与边界的归属》(Emily McKee, *Dwelling in Conflict: Negev Landscapes and the Boundaries of Belonging*),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⑥ 索菲娅·斯塔马托普卢-罗宾斯:《垃圾围城:巴勒斯坦基础设施的生命》(Sophia Stamatopoulou-Robbins, *Waste Siege: The Life of Infrastructure in Palestine*),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⑦ 穆尼拉·哈亚特:《战争景观:南黎巴嫩抵抗和生存的生态》(Munira Khayat, *A Landscape of War: Ecologies of Resistance and Survival in South Lebanon*),奥克兰: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

然科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充分吸收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地质考古学、文化地理学、生态学及流行病学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为中东环境史家重建中东生态系统及其运行的历史图景提供了基础^①。环境史的概念进入中东史研究后,中东环境史的学者们又大量挖掘了与灌溉、粮食、木材、人口、疾病相关的档案文件等书面文献材料,涉及阿拉伯语、现代土耳其语、奥斯曼土耳其语等多语种史料。其中,得益于中东地区存留下来的大量气象与文字材料,气候史研究成为中东环境史当中进展最快的方向之一,学者们得以从沉积物、孢粉、树木年轮等方法中重建中东的气候与景观变化。

此外,过去几十年里对环境问题产生强烈兴趣的人类学研究在近年来的中东环境史跨学科方法运用中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相关学者重视案例研究,通过实地田野调查撰写民族志,重点关注地方族群知识与经验。近年的民族志研究包含了一系列环境主题,如阿曼的石油与社会生活、埃及的水政治、内盖夫的土地冲突、海湾地区的景观设计以及土耳其的渔业^②。这些研究契合当前中东地区面临的现实问题,指出了环境正义与政治冲突之间的联系。

二是运用环境互动视角重构中东传统史学。通过重建中东气候条件变化以及人类与环境互动的历史,学者们对学术史上争论已久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实现中东环境史与政治史、社会史的有机结合。最为典型的便是对奥斯曼帝国衰弱命题的探讨,奥斯曼帝国历史叙事与研究范式近年来产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学者开始摒弃衰弱论范式,认为17至18世纪帝国的主要特点是适应与转型,一种“转型论”的新范式被构建起来。中东环境史家不再徘徊于元话语层面上的模糊叙事,他们对16世纪末到18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气候环境与社会状况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从环境史的角度构建出一部新型的奥斯曼帝国史。以阿兰·米哈伊尔为代表的中东环境史学者将奥斯曼帝国视为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瘟疫、动物、木材、水、生产知识都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众多因素彼此依赖、相互连接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体,任何局部的变动都将牵一发而动全身^③。他们运用生态系统的视角探究奥斯曼帝国历史,从气候、灌溉、疾病等具体环境要素出发全面分析了帝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将17世纪重新解释为动荡与转型的时期,而不再是停滞与衰弱时期^④。由此,环境史研究揭示出帝国细致、复杂和多样的面貌,修正了传统“中心-边缘”范式,构建生态网络模型,从而实现了方法论上的重大创新。

环境史给中东史带来的视野转向为中东乃至世界历史上的重大命题带来了新的解释。从公元前两千纪中叶到公元14世纪,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形成过三次大冲击,游牧世界催生出强大的军事机动能力,长期享有对农耕世界的优势地位^⑤。然而15世纪之后,游牧世界的优势迅速消失。以能源结构解释游牧世界的这种变化会发现,动物能量的低成本优势使游牧民族能够在与定居农业社会的交往中获得巨大的优势,但长期不变的能源生产效率使游牧世界陷入停滞,农耕与工业世界的能源效率则在不断提高^⑥。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奥斯曼埃及,能源结构由家养牲畜转向人力和机器的过程也是经济商业化的过程,是埃及现代化转型的起步。

此外,环境史研究者响应“自下而上”认识历史的观点,通过将研究聚焦到广大的底层农民,中东环境史学者展开了对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治水社会”与“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批判。魏特夫认为在干旱与半干旱地区,需要集中控制灌溉的环境决定了专制主义的产生,对自然的控制将会导致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专制统治。然而,米哈伊尔指出,尼罗河主要是通过埃及农民按照数百年的经验进行日常的运作和维护,灌溉是一项赋予农民权力的活动,而非由专制君主控制^⑦。奥斯曼埃及实行着传统乡村社群自治的模式,帝国政府尊重地方经验,依靠地方社群的知识和经验弥补帝国政府地方知识的不足。因此,农民不单单是权力网络中的被动参与者,而是实实在在拥有影响力和

① 阿兰·米哈伊尔编:《沙中之水:中东和北非的环境史》,第3页。

② 特萨·法莫、杰西卡·巴恩斯:“中东北非的环境与社会:导言”,《国际中东研究学刊》第50卷第3期(2018年),第376页。

③⑦ 阿兰·米哈伊尔:《奥斯曼的树下:奥斯曼帝国、埃及与环境史》,第237、xiii页。

④ 阿兰·米哈伊尔:《奥斯曼埃及的自然与帝国》,第26~27页;萨姆·怀特:《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的气候异变》,第3~4页。

⑤ 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第47~57页。

⑥ 理查德·W.布利特:《干旱地区的历史与动物能量》(Richard W. Bulliet, “History and Animal Energy in the Arid Zone”),阿兰·米哈伊尔编:《沙中之水:中东和北非的环境史》,第53~54页。

话语权的能动者,奥斯曼埃及的灌溉事业并未导向专制主义。

三是注重从全球视角考察中东环境史。环境史将跨国别与跨地域视野作为基础而非创新,其研究视角突破了地理和政治的界限,用统一的眼光和诠释框架探究看似毫不相干的历史承载者与相距甚远地区之间的隐秘连接。中东环境史力图突破原先狭窄的视野范围,不再局限于围绕某一特定时间与地区的政治军事事件展开论述,而是将中东置于全球史的视野之下,重点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物种交换对中东世界的影响,凸显了区域研究与全球史观的结合。这种宏阔的全球史视野正是由中东处在全球地理位置上的重要节点地位决定的。同样,全球气候、农作物、疾病的扩散也受到了中东环境变化的影响,而这些生态要素的流通并不受政治、宗教、民族等人文地理空间划定界限的控制。因此,这意味着,中东环境史不应把帝国省份或民族国家的空间作为一个有界的、封闭的分析单位。环境史的新视角带领学者超越静态的领土概念,考察特定自然要素的变化轨迹。

中东地区的生态网络与全球紧密相连。1783年冰岛拉基火山的爆发造成了全球性的影响,随后几年里埃及尼罗河水量急剧减少,干旱、饥荒造成农业歉收、牲畜大量死亡,使得乡村土地和劳力资源日益被地方精英垄断,这不仅推动了奥斯曼埃及能源结构由畜力向人力转型,更是加速了埃及乡村权贵摆脱帝国中央政府管控的进程。此前的历史学者专注于政治因素,将拿破仑入侵和穆罕默德·阿里改革视为埃及历史的重要分期。然而,环境史的全球视角转而强调全球气候变迁对埃及历史转型的巨大推动作用,由此对传统的历史叙事与历史分期形成冲击。另一方面,中东环境史的研究深切关注塑造人类历史的气候力量,通过思考气候变化如何渗入社会群体真实生活,实现与气候史的宏大叙事互相配合、相得益彰,而不是把气候变化抽象为空洞和遥远的全球现象,与个体生命毫无关联^①。

四是强调中东环境史研究的非线性叙事。中东环境史明显受到了环境史学整体发展的推动与影响,在方法论层面上吸收了后者成熟的批判性与解释性工具^②,在范式层面迅速呈现出对衰败论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反思与超越,走向多元立体的非线性叙事^③。针对长期以来东方学家们指责中东本土居民落后的生产性活动导致该地区环境退化的东方主义假设,从事中东环境史的学者们试图通过引用大量生态科学证据纠正帝国主义对该地区的环境想象^④。殖民学者认为中东环境遭受了不可逆转的退化,这种衰败论叙事将环境退化的原因归咎于游牧生产方式对土地的不合理开发,而欧洲殖民者则为自己的到来塑造了一种进步叙事,即通过开明的殖民统治改进处于生态边缘下的殖民地环境。也有部分学者受到气候决定论的影响,认为长周期的降雨与干旱导致了中东环境的脆弱性,而非人类活动的破坏^⑤。这种简单论证的环境退化观点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环境史作品,构建出中东地区长期的环境衰退印象。与衰败论相对的现代化范式,其实质则是一种建立在帝国殖民基础上的进步论叙事,是利用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克服落后的土著知识、低级与高级文明之间的等级划分^⑥。中东环境史研究超越了评判衰败与进步的立场问题,殖民帝国在中东塑造的环境叙事旨在为自身活动提供合法性,中东原住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所积累的本土知识与传统智慧则受到打压,转而强调中东环境自身的特性,肯定了中东地方性知识的价值。

中东环境史家通过运用气候学、环境考古学等实证研究证明中东地区环境的长期生态恢复力,认为中东地区在至少三千年的时间里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东的动植物并不能被证明特别容易受到森林砍伐或侵蚀作用的影响,反而表现出了持久的生态恢复力。环境史学者同时注意到,长期的环境连续性并不意味着中东环境是长期稳定的,也不是没有重大生态危机的环境史,继而发展出一种新

① 阿兰·米哈伊尔:《奥斯曼的树下:奥斯曼帝国、埃及与环境史》,第218页。

② 约翰·布罗伊奇:“英国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的水政策:环境东方主义与社会转型”(John Broich,“British Water Policy in Mandate Palestine: Environmental Orientalism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环境与历史》(*Environment and History*)第19卷第3期(2013年),第260~261页。

③ 伊丽莎白·威廉姆斯:“中东北非的环境史”,阿迈勒·加扎勒、廷斯·汉森编:《牛津当代中东北非历史手册》,第3页。

④ 戴安娜·戴维斯:“中东北非的权力,知识与环境史”,《国际中东研究学刊》第42卷第4期(2010年),第657~658页。

⑤ 丹尼尔·奥伦斯坦、阿朗·塔尔、查尔·米勒编:《废墟与重建:以色列环境史》(Daniel E. Orenstein, Alon Tal, and Char Miller, eds., *Between Ruin and Restoratio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Israel*),匹兹堡:匹兹堡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

⑥ 侯深:《文明演化的另一种叙事——反思环境史中的衰败论》,《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7期,第117页。

的范式:既非环境持续退化,也非长期稳定,而是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持久性的环境复苏^①。这一认识超越了简单的退化与进步二元叙事,不再是单向度或片面的历史观,能够关注到更长时段时间尺度下,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变与不变。因此,中东环境史研究实现范式转换,重塑学界对中东环境变迁模式的理解,为研究人类社会适应机制提供重要视角,反映出中东环境史学者反思生态危机的多元路径。

四 结语:中东环境史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环境史作为中东史的一个新兴领域,近年来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兴起,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耶鲁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维也纳大学、希伯来大学等高校开始开设中东环境史的研究或教学方向,相关学术会议也被推上议程、议题不断深入^②。2017年10月德国汉堡大学举办了题为“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的环境史”国际会议,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致力于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环境史的学术会议,会上决定正式成立土耳其环境史研究网络(NEHT),为世界各地的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环境史研究者提供合作交流的平台,之后每两年定期召开一次研讨会,此后第二届与第三届大会在2019年与2021年分别于安卡拉与维也纳成功召开^③。这一切均推动着中东环境史研究的发展。总体来看,中东环境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之处。首先,研究对象单一,研究议题多元但不够平衡,现有成果多集中在奥斯曼帝国环境史领域,对殖民时期及20世纪下半叶中东民族国家时期的环境史研究相对较为缺乏。其次,研究区域上更多关注农村、河流等生态系统,较少关注中东的城市、海洋地区。最后,在研究方法上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化。因此,中东环境史研究仍有大量空白与薄弱领域,至少有以下几个方向值得未来继续深入研究。

第一,在中东城市史研究基础上,发掘中东城市建设与治理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加强中东城市环境史研究。作为环境史的一个新兴分支领域,城市环境史是环境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与城市史、技术史、建筑史等分支深度结合的产物,主要探讨城市与自然的互动。城市环境史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巨大进展,尤其是在美国和西欧的环境史研究中,主题包含公共工程、基础设施、绿地管理、卫生、空气、水、土地污染、废弃物处理等。美国知名环境史家马丁·麦乐西把环境史定义为“关于物质环境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并指出“城市在这样的定义中拥有一席之地,更准确地反映了该领域的本质”^④。中东城市是人类城市文明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其所创立的伊斯兰城市文明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东史中的城市大多是从建筑史、社会史和跨国史(以丝绸之路为中心)等角度来考察的^⑤,而城市与环境问题并未得到深度探讨。

第二,从中东本土军事活动的特点出发,分析军事与环境的双向塑造关系,加强中东军事环境史研究。随着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战争等军事活动逐渐被纳入环境史研究的视野内,军事环境史成为环境史新近涌现出的一个重要分支。军事活动往往代表着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剧烈互动,常在短期内重塑地表生态。水资源匮乏,以及山地、沙漠、河流遍布的中东环境特征,深度影响到中东国家

① 萨姆·怀特:《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的气候异变》,第8~9页。

② 例如,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开设有“近东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和“石油与水:中东非环境与技术”(Oil and Water: Environment & Technolog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等课程。

③ 奥努尔·伊纳尔:“奥斯曼与土耳其环境史:概述”(Onur Inal, “Ottoman and Turkish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 Overview of the Field”),《环境与历史》(Environment and History)第24卷第2期(2018年),第299页;土耳其环境史研究网络:“奥斯曼与后奥斯曼时期的环境史——人类世:从帝国到民族国家”(Network for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urkey, “Environmental Histories of the Ottoman and post-Ottoman World The Anthropocene: From Empire to Nation-States”),<http://www.envhistturkey.com/meetings/2021-vienna/>, 2020—09—15/2022—03—28。

④ 马丁·麦乐西:“城市在环境史中的角色”(Martin V. Melosi, “The Place of the City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环境史评论》(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第17卷第1期(1993年),第5页。

⑤ 尼姆罗德·露兹:《中东马穆鲁克城市:历史,文化和城市景观》(Nimrod Luz, *The Mamluk City in the Middle East: History, Culture and the Urban Landscap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泽内普·切利克:《伊斯坦布尔的重建:19世纪奥斯曼城市肖像》(Zeynep Çelik, *The Remaking of Istanbul: Portrait of an Ottoman C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的军事策略与战争方式。中东是世界上最为动荡的地区之一,军事往往给区域环境造成持久灾难,反过来改变军事活动。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与20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更是给这一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环境后遗症”^①。未来战争会越来越呈现出高科技化与信息化的特点,对人与自然的危害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进一步加强中东军事环境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现实关怀。

第三,应进一步将中东纳入伊斯兰世界的整体之中,探讨环境与伊斯兰世界的互动。其中,伊斯兰文明的环境思想史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中东不同地区和时代的各种伊斯兰文本对环境都有怎样的认知?阿拉伯人、伊朗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等伊斯兰社会不同的群体是如何在相同的自然空间与环境中思考与实践其环境思想的,他们与环境的互动存在怎样的差异?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将进一步丰富中东环境史研究的主题。

第四,加强中东社会与环境互动研究,推动中东环境史的“文化转向”。种族、性别、阶级等分析工具尚未在中东环境史研究中得到充分利用,大多数研究停留在物质层面分析,片面强调生态环境变迁,重视自然科学知识,未能达到“环境史的文化转向”。因此,如何更进一步促进中东环境史与社会文化史的融合,补足目前的薄弱研究领域,将是中东环境史下一阶段的任务。

除此之外,中东地区的难民环境史、沙漠史及部落环境史也是未来重要的研究议题。从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至2010年爆发的阿拉伯剧变,中东地区产生了大量的难民,这些难民大多都生活在以色列、土耳其、伊朗等异国他乡,难民与环境的互动将是理解中东难民问题的新视角;沙漠作为中东最大的地理区域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广泛的关注,其形成史及其与中东各民族的互动历史值得深入挖掘^②;部落是理解中东政治与社会的重要工具,其与环境的互动,尤其是与传统农村社会和现代城市社会的互动需要深入研究。

近年来,这些方面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塞缪尔·多尔比(Samuel Dolbee)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特别关注奥斯曼帝国晚期沙漠、蝗灾与难民、游牧民族之间生态联系带来的族群关系裂变,为奥斯曼帝国向民族国家体系过渡提供另一种历史叙事。通过追踪蝗虫迁徙与治理路径,塞缪尔·多尔比分析蝗灾对地理景观的破坏如何改变阿拉伯和库尔德游牧民族、亚美尼亚流放者、亚述难民的命运,蝗虫与这些流动群体最终共同塑造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的边境地带杰济拉(Jazira)地区的行政与自然边界^③。其中,塞缪尔·多尔比重点考察1908—1918年间亚美尼亚流放者与杰济拉地区蝗灾之间的复杂关系,将亚美尼亚大屠杀置于该区域长期管控的历史脉络中加以探讨。杰济拉地区地处干旱地带,最初于1871年为安置游牧民族而设,后来却成为帝国大量亚美尼亚人的被驱逐地。从1915年奥斯曼驱逐亚美尼亚人开始,帝国常利用沙漠发动种族暴力,亚美尼亚人也会利用沙漠生存,揭示出暴力事件与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沙漠成为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的主要目标,人道组织致力于将亚美尼亚儿童从沙漠中带走,并通过建立亚美尼亚农业区来改造沙漠本身。然而,一些亚美尼亚人仍然留在杰济拉,自称为亚美尼亚穆斯林,以纪念他们的“沙漠传统”。

特别可喜的是,环境史在我国的中东史研究视野中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在彭树智的文明交往论中,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交往的四个组成部分之一被正式提出:“只讲物质、精神、制度文明,而不讲生态文明,也就疏忽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综合性和整体性交往关系;其结果便忽视了生态文明对人类文明交往的制约作用。人与自然是统一的,人起源、依靠、发展、归结于自然。”^⑤在他看来,

① 贾珺:《高技术条件下的人类、战争与环境:以1991年海湾战争为例》,《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第114页;威廉·阿金、达米安·杜兰特、玛丽安妮·切尼:《现代战争与环境:海湾战争案例研究》(William M. Arkin, Damian Durrant, and Marianne Cherni, *Modern Warfare and the Environ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Gulf War*), 华盛顿:绿色和平1991年版。

② 马丁·威廉姆斯:《当沙漠是绿色的:我们最大的沙漠是如何形成的》(Martin Williams, *When the Sahara Was Green: How Our Greatest Desert Came to Be*),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③ 塞缪尔·多尔比:《权力蝗虫:现代中东的边界、帝国与环境》(Samuel Dolbee, *Locusts of Power: Borders, Empir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④ 塞缪尔·多尔比:《帝国末日的沙漠:亚美尼亚大屠杀的环境史》(Samuel Dolbee, “The Desert at the End of Empire: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 《过去与现在》(*Past & Present*)第247卷第1期(2020年),第197~233页。

⑤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多维互动中积极、良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形态^①,世界历史就是“人与自然互动的社会文明交往史”^②。因此,历史研究者应当“把人类的历史活动放在大自然界这个大环境中去认识”,“忽视环境的作用,将使历史研究受到很大局限,而只能看到浮在表层或中层的现象”^③。对于中东地区的生态文明探讨,彭树智认为,中东是人类文明和世界三大一神教的发源地,当地的环境生态无疑在历史的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中东同时也是一个环境脆弱的地区,因而生态文明是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接着,彭树智针对具体个案,从古代的生态环境到今天的生态问题,全方位地探讨了中东的生态文明问题,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有关问题奠定了基础。这些思想的提出有力地推动着环境史进入我国中东史的研究视野内。

当前,国内中东研究界已有少量对环境史研究的尝试。赵克仁论述了沙漠生态系统与尼罗河绿洲生态系统对古埃及农业灌溉、动植物生态循环的影响^④。然而,与环境史研究较为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的中东环境史研究明显不足。对于中国中东环境史研究的开展,一方面要充分吸收国内外环境史研究的先进思想与方法,补充环境科学与生态学的跨学科知识储备,关注中东的生态问题,加强研究的现实关怀;另一方面,既要鼓励中东史研究学者与环境史研究学者合作开展研究,也要加强与国外中东环境史研究学者的交流。

收稿日期 2022—07—20

作者张玉友,法学博士,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中东研究所副教授;应添翼,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陕西,西安,710069。

The Environmental Turn in the Study of Middle Eastern History and Its Field Expansion

Zhang Yuyou and Ying Tianyi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field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has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in the past ten years, and has made important progress, which leads to the environmental turn in the study of Middle Eastern history. The rise of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search of the Middle East is based on the need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increasingly in-depth studies of Middle Eastern histor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represents a new trend in current study of Middle Eastern history. Relevant researches mainly focus on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ecological issues,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climate change, natural disasters, energy development,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colonial empire's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he indigenous knowledge of the Middle East. These research topics aim to re-understand and construct th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from the new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so as to deeply interpret and analyze the traditional macro-narrative of the Middle Eastern world from its rise to its decline. It also focuses on the influence of colonialism on the Middle Eastern environment, examin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and correcting the region's declensionist narrative of longstanding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Overall, despi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studies of the Middle East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research gaps, and many frontier methodologie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ould be further utilized.

Keywords: Middle East; Environmental Histor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clensionist Narrative; Arab

【责任编辑 李 恒】

① 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3页。
② 彭树智:《老学日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1页。
③ 彭树智:《松榆斋百记:人类文明交往散论》,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
④ 赵克仁:《自然生态对古埃及早期社会的影响》,《中东研究》2019年第2期,第92~109页。